



MMS

Modern Media Studies

MMS, Vol. 1, No. 2, 2025, pp.235-246.

Print ISSN: 3078-3151; Online ISSN: 3104-5049

Journal homepage: <https://www.mmsjournal.com>

DOI: <https://doi.org/10.64058/MMS.25.2.07>



检视“泛娱乐化”视域下的当代话语狂欢和众声喧哗

周建强 (Zhou jianqiang)

摘要：新融媒体智能视读的娱乐文化对人思想认识、认知方法，乃至整个社会文化发展趋向产生了深刻影响。针对当下网红文化经济异军突起，所引发的娱乐狂欢对现实性价值的狂热寻求，进而在其众声喧哗中迷失思想精神的超验性意义迷思。社会公共文化话语，由群体理性与秩序逐渐转变为个人社会性话语的碎化与撕裂、暴力与对峙、娱乐狂欢。数智时代需要检视大众娱乐文化与娱乐大众的信息话语，会消解和离散国家主流意识，也会侵损个人价值判断、人生品位与道德底线。故此，亟需警惕“泛娱乐化”的危与机，探究“泛娱乐化”话语狂欢与众声喧哗形成的原因，进而构建健康规范的实践发展路径，以免迷失人生目标与真谛，蚀化生命价值与意义，腐化存在镜像与意识幻象。

关键词：网红经济文化；泛娱乐化；狂欢理论；众声喧哗；当代性检视

作者简介：周建强，教育博士，伊犁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教师。研究方向：语文课程与教学。电邮：909718885@qq.com。

Title: Examine the Carnival of Contemporary Discourse and the Uproar of the Crow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an-Entertainment”

Abstract: The entertainment culture of new integrated media’s intelligent visual reading has profoundly influenced people’s understanding, cognitive methods, and even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trend of social culture. In response to the current rise of internet celebrity culture and economy, the resulting entertainment frenzy manifests an avid pursuit of realistic values, leading to a loss of the transcendental significance of thought and spirit amid the cacophony of voices. Public social culture discourse has gradually shifted from collective rationality and order

to fragmented and torn individual social discourse, marked by violence, confrontation, and entertainment fervor. In the era of digital intelligence, it is necessary to examine how mass entertainment culture and the discourse of entertaining the masses can erode and disperse the mainstream national consciousness, as well as impair personal value judgments, life taste, and moral boundaries. Therefore, it is urgent to be vigilant about both the dangers and opportunities of ‘pan-entertainment,’ to explore the causes behind the discourse frenzy and cacophony generated by ‘pan-entertainment,’ and to construct a healthy and regulated path of practical development, so as to avoid losing life goals and truths, eroding the value and meaning of life, and corrupting the mirror of existence and the illusions of consciousness.

Keywords: Internet celebrity economy and culture; Pan-entertainment; carnival theory; The crowd was in an uproar; A Contemporary Review

Author Biography: Zhou Jianqiang, Doctor of Education,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Yili Normal University. Research interests: Chinese language curriculum and teaching. E-mail: 909718885@qq.com.

引言

伴随互联网与智能传媒时代的来临，人类已步入一个以娱乐为主导的社会阶段。个体思想逐渐被感官化、碎片化的信息洪流所淹没，陷入视觉狂欢与浅层阅读的“娱乐盛宴”，与主流价值观念和信仰体系日渐疏离，甚至在隐喻化表达、快餐式阅读、感官刺激与网络暴力交织的娱乐化语境中面临“娱乐至死”的风险（刘文辉，2018）。智能手机、网络游戏及各类娱乐资讯充斥屏幕，时间在频繁刷屏中悄然流逝。人们在无意识消耗与事后懊悔的循环中陷入精神内耗，逐步丧失对深度思考的自主性，直至被娱乐彻底裹挟（何晓兵等，2017）。当娱乐成为日常生活的核心，社会价值观体系遭遇严峻挑战。努力奋斗、诚实守信等传统美德受到忽视，年轻一代的价值认知出现偏离。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将成为“明星”或网红作为人生理想，而非崇尚具有家国情怀的科学家或担当社会责任的企业家。在个人名利驱动下，泛娱乐化趋势不断迎合娱乐资本的逻辑，催生出一批被网民追捧的“网红”，构筑起以“短、平、快”为特征的“奶头乐”式娱乐幻象（朱志平等，2024）。所谓“短”，体现为短视频与碎片化阅读的盛行；“平”，表现为以直播打赏与带货为形式的“平等交互”，实则将价值简化为即时交易；“快”，则指向网络直播所带来的迅速成名与收益变现。^[4]在这种“娱乐至上”的文化生态中，公众在物质生活水平显著提升后，转而追求精神文化层面的满足，但其方式却陷入娱乐化的惯性之中。人们习惯于“娱己”“娱人”乃至“娱于名利”，难以突破“信息茧房”与“娱乐铁屋”的桎梏，缺乏对娱乐侵蚀的警惕与抵御能力，最终沦为娱乐与资本的被动接受者（文春雪，2023）。面对网红经济的表面繁荣，我们有必要保持理性认知与精神清醒。董宇辉、郭有才等个案的成功，并不代表普遍现实。生命的成长远比一夜暴富更具价值，不应被表象的娱乐狂欢所迷惑。应深入思考泛娱乐化对社会价值观的深层冲击，警惕其带来的价值虚无与精神迷失（楚小庆，2022）。人类生而不为娱乐，亦不应为娱乐所奴役。唯有树立理性自觉，方能避免在娱乐浪潮中丧失主体性，防止成为“悲喜交加”的娱乐附庸。

一、狂欢理论的引入与当代“泛娱乐化”文化话语语境的现实样态

（一）网红经济文化的理论审视：基于巴赫金狂欢理论的视角

网红经济文化，是伴随“网红文化—网红经济”动态演化，而形成的新型交互式文化形态，体现了现实世界与数字世界的多元交织。该现象融合了社会从众心理、流行文化传播与经济普惠机制，呈现出鲜明的文化博弈特征。从社会文化视角审视，当前泛娱乐化现象可借助巴赫金狂欢理论予以解析。观察其参与主体，可见网红主播更侧重经济回报；而粉丝群体，则倾向于寻求思想交流与情感联结。作为互动主导者，网红主播，通过精心构建的话语符号体系实现价值交换。然而，资本的大规模介入，也使该文化形态面临过度娱乐化与精神信仰缺失的风险。狂欢理论，描绘了传统秩序被暂时悬置的场景，奇装异服、街头歌舞等的行为表现，消解了日常社会界限，营造出“自由”与“平等”的氛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2021）。巴赫金在其《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中指出，狂欢通过加冕、脱冕、戴面具等行为，使人象征性地实现拥有财富、权力与自由的梦想（李开复等，2022）。该理论，强调了全民参与、平等对话的核心特质，其精神实质在于颠覆等级秩序并促进开放交流（燕道成等，2019）。在互联网时代，现实与网络空间的划分，与巴赫金提出的“第二世界”隐喻高度契合（叶虎，2006）。众多学者运用该理论阐释网络文化，其核心概念，包括“狂欢节”“狂欢式”与“狂欢化”（巴赫金，1998）。真正的数字狂欢，并非对中世纪仪式的简单复制，而应体现为对流行文化的批判性反思。因此，网红经济文化的健康发展，需回归狂欢文化的本质内核，追求个体自由与个性解放，并秉持科学与正向的人文价值取向。

1. 狂欢节

狂欢节，最初是一种为祭拜农神而举行的民俗活动，在这一天，人们放下手头的活计，畅所欲言，尽情地狂欢。在中世纪，所有以献祭为目的的狂欢节活动，都体现着狂欢理论。到了浪漫主义时期，歌德注意到了狂欢节的全民性，即人人都可以参加狂欢。狂欢节，在狭义层面，是指某一特定的节庆日，在这一特定的时间里，人们可以纵情欢乐，摆脱平时里长幼尊卑等级观念的束缚，平等而又亲昵地交往。虽然狂欢节的游艺形式错综复杂，但它是狂欢节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并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民族的变迁而变化。狂欢节，最重要的特征是“广场式的自由自在的生活”，与教会统治下的服从于严格僵硬的等级秩序，使其常规生活处于一种对抗状态，因而，是“第二种生活”（范靖，2022）。

2. 狂欢式

狂欢节的游艺形式的总和，也被称为狂欢式。所谓狂欢式，是指一切狂欢节式的庆贺、仪式、形式的总和，是一种仪式性的混合的游艺形式。狂欢式的组织实施形式，已超越了线下传统的三维时空的空间模态。狂欢节也已从现实世界，走向了统整融合现实世界与虚拟网络世界的多元互动模态和多生成维度，已从个人狂欢走向广场狂欢与网络世界的话语信息符号狂欢的“众声喧哗”，超越了时空的阻隔，而进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记录与纪实。经由数智时代的记忆岁月与岁月记忆的信息话语沉淀，这已演变成为一种流行文化。按照巴赫金关于狂欢的定义，“狂欢式”可以划分为四个范畴。第一，是在狂欢节里，人们可以随意亲密地相互碰触；第二，是插科打诨的共处之道；第三，是人们平等亲昵的生活态度；第四，是一种对神圣嘲弄的粗鄙，它同时又能维持一种平民的生活风格（张素玫，2006）。

3. 狂欢化

狂欢化，是巴赫金狂欢理论中的一个中心术语，在狂欢节上，形成了整整一套表示象征意义的具体感性形式的话语信息符号的狂欢化。巴赫金认为，“狂欢节已经形成了一套专属的语言体系，它是感性的并有其象征意义。”这些话语信息符号，并不都以文字形式出现，也可能是舞台表演。人们无法将这种视觉语言信息符号，用准确的文字表达出来，但能够转化为与其意思相近的形象化的艺术语言（巴赫金，1988）。也就是说，“狂欢式转化为话语信息符号的狂欢化，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狂欢化。”

（二）当代“泛娱乐化”文化话语语境的现实样态

尼尔·波茨曼，在其传播学著作《娱乐至死》中，曾预言，电子媒介的出现与发展会对大众文化产生巨大影响，使得大众文化趋向于娱乐化与媚俗化。法兰克福学派，也曾对大众文化的娱乐化与媚俗化现象进行过深入批判。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电子媒介信息，及其伴随着媒介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我国信息智能化的传播媒介手段日趋成熟，信息传播媒介的文化也日益丰富。但是，从信息智能化传播媒介的表达方式与表现内容来看，却显示出一些突出的问题。我国目前以大众媒介为首的媒介文化，所存在的六大问题，即“同质化”“明星化”“媚俗化”“幼稚化”“拜金主义”（麻馨心，2023）。

1. 文化主体的“非主流化”与外部客体的“虚无化”

倘若未来真如波兹曼所言走向“娱乐至死”，其前提必然是人类文明遭受娱乐化的侵蚀与颠覆，文化内生的主体性，被边缘化为“非主流”，而外部文化客体则陷入“虚无化”的境地。换言之，“娱乐至死”的时代，其本质上是一个文化虚无与文明被娱乐异化的时代（刘秀真，2017）。在信息爆炸与娱乐主导的当下，个体如何避免在看似快乐的过程中，无意识地虚度生命，直至临终时才惊觉岁月蹉跎、意义空洞。短暂的感官愉悦，能否等同于人生的全部幸福。正如一位哲人所言，“快乐总是短暂，痛苦却常存”。若除却转瞬即逝的狂欢之外，我们一无所有。那么这种快乐是否真正触及幸福的本质，或许我们至死都困于虚幻的泡沫与讹传的链条之中；或许我们正如鲁迅笔下“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被吃者”，或许自觉不自觉地成为契诃夫所描绘的既“害人”又“自戕”的“套中人”。人生固然需要娱乐，以此作为调剂与动力，但它绝非生命意义与价值的全部。在信息智能与娱乐浪潮席卷的今天，人们必须警惕“娱乐至死”所带来的精神湮没。娱乐易成瘾，那种看似无害的，实则基于他人的生活窥视与感官刺激的娱乐消遣，实则作为一种精神上的“安乐死”。虽是兴奋剂，更是致幻剂。

2. 感官视读盛宴快感消解反思深度与思想批判

娱乐话语“隐喻”的感官视读盛宴快感，一方面，消解了信息解读的反思深度与自我思考意识，另一方面，娱乐视读，已经成为当代青少年阅读学习的主要方式，且占用了他们大量的时间。娱乐视读的感官盛宴，稀释了浏览者（学习者）主题性的思维想象与思想批判，“娱乐业时代”的视读感官盛宴，曾经表现为“三俗”，即低俗、庸俗和媚俗，与“恶搞”的态势。这种发展态势，在无目的性的娱乐智能媒介浏览中，将经典名著阅读学习边缘化，通过电子书方式展开阅读的群体受众，已经超过纸质书传统方式进行阅读的受众。现如今，在地铁里、火车上，随处可以见到“低头族”捧着智能手机等电子产品看视频、看小说、刷抖音消遣时光的景象，当然，也不乏有线上办公学习者。以前的纸质媒介文本的阅读方式，已经被智能视频媒介的图像信息视读方式所冲击。前者是，

主客体间的客体文本符号与背景世界、读者与创作者的主体思维的想象编解码，及其思想精神的多元多维的对话交流；后者是，居于主体强势话语或娱乐消遣话语，其对于客体视读观众的单向度的话语表达和行为表演。纸质文本符号阅读，是主客体在世界时空语境中思想精神的平等对话（李汶炫，2012）。

3. 众声喧哗碎片化精神与萎缩思想成长和创新想象

信息智能化媒介视读，是主体话语的狂欢与喧哗对客体视读者的感官盛宴，或思想情感倾泻碾压，或音像强势直接植入。这一过程，减缩了思想精神交流对话的话语时空，鲜明直观的影像视读，萎缩了思想成长与创新想象。卫星传输的图像信息通讯，及其互联网智能化媒介，已经使普通民众，可以实时触读到较之前数以千万计激增的各类信息资讯。每一位身处现代社会的个体，被信息洪流裹挟其中信息过载，面对铺天盖地且实时更新的各类信息。在社会媒介的主体掌控操纵热点话语传播的单向度“诠释”过程中，这一过程的话语“诠释”，离事实真相的时空差距，有可能使人们不知不觉中演变为“传谣者”“谣传者”和“愚弄者”。这一过程，会使人们渐渐变得人云亦云，笃信虔诚。人们越来越被单向度的信息话语束缚、捆绑与绑架，习惯性缺少自我思想和精神对话。在这个过程中，越来越多的人，通过智能手机及其电子产品的信息资讯浏览，自觉不自觉在快感视读、感官娱乐中，不知不觉死去，娱乐至死。

4. “泛娱乐化”孕生行为失范与违法乱象

互联网的信息时代，“泛娱乐化”孕生了，网络暴力、网络暴民、水军炒作、网络诈骗与低俗直播等诸多行为失范，甚至违法乱象。不可否认，在这个娱乐业高度发展或过度发展的时代，你不娱乐别人，别人就娱乐你。娱乐，甚至沦落为低俗恶搞、噱头炒作、隐私爆料的娱乐狂欢的“天堂”与“地狱”。娱乐业与娱乐媒介，这种非常态的超高速发展，特别是引发了广大青少年对于娱乐圈，及其明星的痴迷追捧爆棚炽烈。随之迎面而来的光环名利、鲜花掌声，在各级“粉丝”痴迷追捧下，光怪陆离、“幻象丛生”，许多影视明星的个人隐私，被无限炒作，一些明星谈个恋爱、结个婚、离个婚，都会被大众娱乐媒体“炒作”，使其成为社会受众茶余饭后的谈资。其盛大热烈的隆重程度，掩盖过了值得受国人追捧的获得世界诺贝尔生物学奖的科学家屠呦呦。娱乐圈，成了某些人沽名钓誉的天堂与地狱，娱乐明星们，成为深受娱乐大众心身向往且仰望的职业，业已超越与覆盖了青少年未来成为科学家、教师、医生、解放军、警察、工人等诸多职业期望，俨然已经引领了祖国未来青少年的人生梦想和职业愿景。人们有意无意地“咀嚼”与“消遣”社会“他者”的噱头“故事”和悲苦不幸，或被媒体娱乐信息的资讯“洪流”“裹挟”其中，或被娱乐与消遣，或“被消费”和“信息过载”的资讯过度传播。

5. 网络娱乐的“畸形”发展及其孕生的恶性循环

网络娱乐平台的兴起，为公众提供了广泛的创作与展示空间，有力推动了创意产业的发展，助力个体实现自我价值，并为社会文化注入多元活力。然而，随着行业的快速扩张，“浅表化”内容逐渐占据主流。需指出，“浅表化”，并不必然等同于低质。部分博主仍致力于，创作兼具人文内涵与审美价值的优质作品，在满足娱乐需求的同时，提升公众文化素养。但随着创作者群体的不断扩大，内容质量出现了显著分化。为博取流量，大量低俗、庸俗、媚俗的“三俗”作品，时不时会充斥网络。这些相关内容，缺乏文化深度与价值引导，不仅助长文化浅薄化倾向，也侵蚀公众的审美能力与思维方式。此类作品，因契合部分受众的娱乐偏好，创作成本低且传播收益高。这就会促

使更多创作者，倾向于选择“低投入高回报”的创作路径，而非致力于高质量、高成本却回报有限的内容生产。在这一经济诱因的驱动下，低质内容如潮水般涌现，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恶性循环。这将进一步加剧社会道德滑落与文化素养的退化。因此，如何有效引导和激励高质量娱乐内容的生产与传播，这已成为我国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在此领域亟待综合协同治理与解决的重要社会课题。

二、“泛娱乐化”的话语狂欢与众声喧哗的原因探究

（一）现实物质基础：现代信息技术与科技手段的发展

信息化媒介的网络时代，因为智能手机将国家与世界，链接成为一个亦真亦幻的村落与社区，人们有了广阔无比与前所未有的话语表达路径和言说平台。这是一个众声喧哗的时代，也是一个高效智能、民主自由的时代。娱乐媒介的电影与电视、电脑与手机等智能自媒体，及其融媒体的应运而生，为人们提供了更多更有视读快感享受的休闲娱乐方式与路径，这进一步让普通民众“跨越”了，大众传媒信息话语的传统物理时空的场域受限，从来没有如此之近过，几乎肌肤相亲。这就使其社会交际的时空场域，越来越接近人们面对面的社会信息交际。与此同时，大众媒介信息的“输入”与“输出”接收端，诸如智能手机的高度普及，使得每一位普通民众，拥有从未有过如此高度民主自由，且高效便捷的大众话语的表达网络平台，及其实时时空的在线延伸的虚拟世界。人们要正视泛娱乐化这一问题现象，及其存在的深层原因与影响因素。互联网信息娱乐与娱乐信息平台，塑造了一个又一个“一夜暴富”的网红主播的人生成功的人设“榜样”。普通到尘埃里的普通人，也有可能一夜之间，就能赚到连他或她梦里都不敢想象的财富。一场网络直播大 V 的直播带货，动不动就能挣到几百万，甚至几个亿，这将充分验证了社会信息传播的明星偶像连带效应。这就自觉地引发了，社会群体艳羡那些网红主播，梦想成为少数娱乐传奇人物的虚幻社会“他者”的热度追捧的职业镜像。

（二）文化思想语境：国家民主与社会开放的名利文化资本生态

随着现代社会科技文化的发展进步，社会广大受众接收社会话语信息的方式越来越多元化和快捷化。社会信息媒介形式，如广播报纸、杂志网络等，社会信息媒介的主要功能有文化传承、环境监测、关系协调、娱乐等。多样的社会信息媒介传播方式，在给社会受众提供信息服务、思想引领等正面功能的同时，也显现出了一定的负面功能。人们应科学辩证地看待信息娱乐的正负功能，充分发挥好社会信息媒介传播的功效与作用。社会娱乐，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无论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还是在西方文化里，都有着传承文化和实施教化的重要作用。这就亟须重新审视社会信息娱乐的正负文化功能。基于社会民主与平等自由的进步思想基础，这是社会文化资本的商业化运作，当自由与平等被打包成为名利文化资本消费的“幌子”，投其所好的娱乐天性之“空洞”，将其变幻成为“填充”人生享受、享乐与娱乐的“情意耗竭”与“思想吗啡”，及其成为“精神鸦片”与心灵“毒鸡汤”。这种自嗨式的娱乐幻想，与名利双收的幻象狂欢的社会追捧和追求，这不仅容易扭曲个人的思想价值观念，也易于导致社会风气的喧嚣与浮躁，也使其像一种“精神鸦片”，逐渐侵蚀人们健康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与思想价值观，进而侵损人们的生活质量，而使其深陷“剪不断、理还乱”的人生迷思。

（三）信息媒介基础：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经济法则

从信息媒介的发展角度来看，社会舆论生态的“泛娱乐化”，是信息媒介产业市场化的结果。从电视到网络，社会信息媒介的娱乐功能，被过度强调和加速泛化，尤其是，电子信息网络的出现，对社会舆论生态的“泛娱乐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人人都是自媒体时代的主播”的时代，社会信息网络，成为全民狂欢的数字化舞台，社会舆论生态“泛娱乐化”的态势愈演愈烈。社会网络舆论生态的“泛娱乐化”问题实质，是社会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盛行。探寻“泛娱乐化”舆论生态的治理策略，是构建社会良性舆论环境，维护社会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稳固地位的重要议题。当人们发现自己一辈子的辛苦劳动，还不如别人一天唱首歌、跳个舞的收获所得，那么还有多少人愿意那么辛苦劳动。让越来越多的人，寄希望于通过泛娱乐化而成为“网红主播”，进而能够使其快速成名，以期趋之若鹜地去捞快钱与捞大钱。由此，不少人希望通过互动网络娱乐平台，快速获得“热度”关注，有些网络主播，甚至不惜采取欺诈造假等极端的手段方式。这种泛娱乐化的畸形乱象，自然也潜移默化在无形中影响着下一代青少年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及其群体社会的身心健康。但即使是所谓的“一夜成名”或“一夜蹿红”，其背后往往隐藏着无数的艰辛与付出。如果只是执念于短时间的曝光与热度，以此来获得更多的关注和更大的利益，却忽视了其自身的能力、实力与素养水平。这种不劳而获与急功近利的心态，只会使参与其中的每个人和受众群体，不自觉深陷“众声喧哗”的娱乐狂欢与“海市蜃楼”“幻象效应”的思想精神泥潭。

（四）主流文化影响力弱化对公众思想规训的影响

从文化维度看，中国传统文化，对娱乐形式具有较为深远的影响。在老龄化社会背景下，京剧、杂技等传统娱乐形式，仍保有特定受众群体。然而，由于多数父母将子女托付父辈或祖辈照料的社会现象，尤其在农村，这种现象普遍存在，使其社会家庭代际间的现代教育的思想精神传递，出现了“文化断层”和“代沟撕裂”。这就使得年轻一代的思想观念，深受传统观念制约，致使新兴娱乐形式往往面临传统观念的抑制，而难以广泛普及。此外，在很大程度上，传统道德观与价值观，也影响着人们对特定娱乐内容的接受程度，尤其体现在，对死亡等人生长发育进程中无法回避，且必须直面的客观性与现实性的人生主题的审视取向上。死亡教育，在中国社会亦近乎空白，人们普遍对死亡话题，采取回避态度，缺乏正视与探讨的社会氛围。2024年巴黎奥运会开幕式的舆论反应，进一步揭示了文化接受度的问题。作为全球文化盛事，奥运会开幕式，本是展现法国及欧洲文化底蕴的重要窗口。然而，许多中国观众，却表示难以理解其艺术表达，甚至质疑其合理性。这一现象反映出，在社会性民族文化的对外输出过程中，人们是否对外来文化的输入，存在着一定的屏蔽倾向。社交媒体，如微博、抖音等平台形成的舆论场，既反映了公众对文化表达的态度，也凸显出中国社会在文化开放性与国际交流方面的现实困境。中国，作为具有悠久历史与深厚文化底蕴的国家，理应在全球化与现代化彼此交织的文化发展和开放进程中，不断深化对世界多样性的理解，而非简单质疑或排斥。唯有通过积极的文化对话与共融，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交流与思想进步。

（五）主流意识形态规训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弱化现象

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结构，要以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为核心，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与实践。在娱乐产业中，这一特点，体现为对文化内容的严格审查与导向控制。例如，影视作品必须传递正能量、弘扬主流价值观，以确保思想导向的正确性。虽然，此举有助于维护文化安全与社会稳定，但在实践中，也显著限制了创作的自由度与内容的多样性。为响应国家的相应政策引导，

国内的影视作品创作，呈现出明显的历史题材倾向，其大量作品，聚焦于歌颂革命先烈与传承红色基因。初期，这类社会作品，因契合集体记忆与家国情怀而广受认可；然而，随着同类题材的过度开发，部分创作逐渐演变为机械的意识形态的“宣传工具”，甚至异化为一种商业化的“红色符号消费”，导致公众产生审美疲劳与认同疏离。与此同时，急功近利的创作环境，进一步加剧了内容质量的滑坡。多数导演与演员，倾向于规避社会现实题材，转而投身于低风险、低内涵的通俗剧创作，致使影视短剧的社会市场上，充斥大量缺乏思想深度与文化价值的“肥皂剧”。即便有少数具有批判意识的影视传媒作品，如《断桥》《毒舌律师》等，也常因审查机制而遭遇删改，难以完整呈现创作者的原始表达。面对这一现状，人们亟需超越对异质文化的简单拒斥，转而推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批判性反思和创造性转化。在坚定文化自信的基础上，对外来文化中的积极要素，进行战略性扬弃与本土化融合，将符合时代发展的外来思想观念，植根于本土文化土壤。唯有通过开放包容的文化对话与创新性发展，才能切实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感染力与引领力，推动数智时代的文化进步与文明互鉴，最终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入持续的文化动力。

三、思考与展望

（一）夯实与深耕娱乐界从业者必需的家国情怀与社会责任

在几千年前的亚圣孟子，就曾富于远见地提出“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人们不可否认，娱乐本身的意义与价值。但是娱乐是一把双刃剑，既有正向功能，又有负向功能。“趋利避害”，也是娱乐发展的法则铁律。因此，娱乐应该有精气神，应该有主心骨，应该有思想价值，应该有人生品位，应该有道德底线，应该有家国情怀，应该有民族精神。娱乐，不应只有廉价清浅的笑与“下里巴人”，应该有滚烫的泪水与“阳春白雪”。娱乐，绝不仅仅是为了娱乐而娱乐，为了笑而笑。人们在玩手机网络游戏时，是否感受到自己不是在“玩”游戏，而是游戏在“玩”他们。人们不是在玩手机，而是手机在玩人类，至少是在陪人类“玩”。人类决不能沦落为，娱乐媒介话语的庸众与愚者；更不能堕落为，娱乐视读狂欢盛宴的“鸚鵡学舌者”与“以讹传讹者”，不能蜕变为网络暴民与游戏傻子，更不能异化为娱乐狂欢的疯子与奴仆。

（二）深化“有灵魂、有思想、有温度与有深度”的艺术创作

社会与国家的信息传播媒介主体，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对“受众至上”的矫枉过正，对受众口味的一味迎合与满足，对经济利益的极致追求，对媒介传播者能动引导责任的忽视与缺位，这是导致娱乐负向效能“娱乐至死”问题产生的一个关键。目前，我国社会与国家的视读娱乐媒介，应以优秀娱乐视读作品的个案典范的宣传引领，通过类似李子柒视频全球粉丝数亿的个案范式，在社会国家层面，得到了高度认同肯定与推介。只有如此的视读娱乐的优秀作品，才能够既“叫好”，又“叫座”（丁柏铨，2012）。娱乐别人的人，娱乐至死；被人娱乐的人，同样也会娱乐至死。但愿国家与民族，乃至整个世界，不至于被娱乐至死，人类不至于被娱乐泯灭人性的本色，不至于复归生物性与兽性。真正积极正向的娱乐，应该也能够引导人们，守望亚丁神灯与仰望人类神性的星空。

（三）强化娱乐健康发展的价值观及其意识形态解蔽的守正创新教育

中国长期以来沿袭着应试教育的传统，这种功利性的教育模式，严重限制了学生的思维发展和创造力培养。在这样的环境下，学生的思维活跃度和创新能力被束缚，大多数学生，只追求标准答

案,从而忽略了思考的深度和广度及思想问题的本源。长久的应试教育,使学生缺乏对娱乐产业的认知和兴趣,进一步导致了整个社会对创意、艺术等非传统领域的认知匮乏和支持不足。在这样的教育环境下,很多年轻人在选择从事艺术和娱乐行业时,往往会遭遇家庭和反对和质疑。因为,这些行业与领域,在中国传统文化以及教育体系中,被认为是“不务正业”,甚至是“无法谋生”的职业。这种偏见和刻板印象,使得许多有才华的年轻人望而却步,选择了相对传统与看似更“安全”的职业,从而导致了娱乐行业人才储备的匮乏和创新能力的减弱。在如今数智时代的背景下,人们必须意识到,教育在塑造人才和社会价值观方面的巨大影响。强化娱乐健康发展的价值观,进行意识形态解蔽的守正创新教育,势在必行。这不仅需要教育部门进行教育理念的转变,更需要社会各界共同努力,打破传统教育模式的桎梏,鼓励和支持学生在艺术、创意等领域的职业发展,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造力(隋岩等,2016)。通过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从而实现娱乐产业的健康发展,为国家培养更多有思想、有创意、有担当的人才,促进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提升与社会的全面发展。

(四) 适当调整与聚焦于娱乐产业的新质生产力发展

随着时代的发展与社会结构的改变,中国社会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观,也在不断变化着。传统的家庭观念和道德标准,正逐渐被年轻一代所质疑,他们对于娱乐形式的需求和审美偏好,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的推动下,人们对于个性化、多元化娱乐的追求日益迫切,传统的文化娱乐形式与样态,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考验。所以,我国的文化娱乐产业,迫切需要进行调整和转型,以适应新的社会需求和市场趋势(姚涵,2016)。近年来,国家大力提倡的“传统文化融入时代潮流”,游戏、影视等娱乐形式,正在积极融合和创新,展现出了崭新的面貌。如,游戏《黑神话·悟空》,在其未上市时,仅凭借着一小段试玩视频,便受到万众瞩目;上市之后,更是好评如潮。而它能够在众多优秀的3A游戏中脱颖而出,其根本就在于,该款游戏结合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西游记》,向世界展现了中华文化的无穷魅力。这种文化融合,不仅丰富了娱乐产业的内容和形式,也为传统文化注入了新的生命力和活力。但是,要实现文化娱乐产业的健康发展,人们更需要充分发挥现代科技和创意产业的优势,打造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娱乐产品。如此一来,才能将“中式娱乐”、中国文化产业推向全球与全世界。

(五) 在尊重文化差异基础上理性对待外来文化

我国在引入外国的文化娱乐的进程中,应该采取审慎立场。一方面,出于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需要;另一方面,旨在保护本土文化传统与特色。因此,我国的文化娱乐产业领域,应该对外来的文化元素实施必要的审查,尤其是,对那些涉及敏感的政治议题或价值观的内容,必须保持高度关注。然而,随着中外交流日益密切,特别是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外国文化仍以多样化渠道渗透至国内的文化娱乐市场。这对传统文化传承与主流思想价值观的巩固,构成了一定的挑战。当前,国内的文化娱乐体系,在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高层次审美需求方面,依然存在明显不足。大众对艺术性、思想性娱乐内容的渴望,与现有供给之间形成了一定的落差。部分的文化娱乐产品,过于追求商业效益,导致其思想内容的浅薄化与同质化的现象突出,甚至呈现为“娱乐至死”的不良倾向。以游戏产业为例,多数国内的文化娱乐的上市企业,侧重于产品用户的充值机制设计,而非思想内容的审美价值或社会意义挖掘。相比之下,在国际的游戏产业中,已涌现出被誉为“第九艺术”的优质作品,这些游戏产品,不仅提供了相应的娱乐体验,更通过互动的叙事,引发玩家对社会现实

的深度思考。例如，Rockstar Games 公司开发的《Red Dead Redemption2》，以其对历史背景的尊重与社会问题的深刻刻画。因此，获得了全球游戏玩家的广泛认可，甚至也得到了国内主流媒体的积极评价。中华文化，历来具有海纳百川的包容特性。面对外来文化，应在保持文化自信与文化安全的前提下，采取理性审视的态度，通过批判性的吸收来实现创造性的转化。将外来文化的积极元素与本土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推动文化娱乐产品的思想内涵与艺术品质的发展和提升，使文化娱乐活动成为启迪民智、丰富精神的文化载体，这方为娱乐产业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

文化娱乐，作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社会文化现象，无论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社会情境场域中，还是在西方文明的社会环境中，文化娱乐历来都承担着文化传承与社会教化的重要功能。“娱乐至死”所引发的社会性后果，不仅体现在青少年身体健康水平的下降，如长期沉迷游戏导致的生物钟紊乱，过度使用电子设备而引发的视力损伤等亚健康状态，更深刻地表现在精神层面的价值虚无、思想混乱与意志消沉，以及其情感与理智的背离和道德观念的滑坡。在传统的信息媒体资源匮乏、传播速度相对缓慢的纸质媒介时代，钱学森、焦裕禄、王进喜等国家富强与民族复兴无私奉献的楷模人物，曾成为全社会广泛关注与崇尚的思想精神“偶像”。然而，在数智时代的网络娱乐泛滥的背景下，当前部分青少年，沉溺于虚拟世界的感官刺激，逐渐偏离积极的价值导向。这一现象，在其内容质量与价值引导方面，折射出我国文化娱乐产业存在的不足，亟须通过科学规范的宏观监管与思想引导，推动其健康有序地发展，重塑相关娱乐活动的文化内涵与社会价值。

Funding: This research received no external funding.

Conflicts of Interest: The author declares no conflict of interest.

ORCID

Zhou Jianqiang ^{ID} <https://orcid.org/0009-0003-9505-8271>

References

刘文辉（2018）：“新媒体时代主流意识形态新闻学‘型塑力’弱化及建构”，《学术界》（05）：85-94。

[Liu Wenhui (2018). "Weakening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Shaping Power' of Mainstream Ideological Journalism in the New Media Era." *Academic Journal* (05): 85-94.]

何晓兵、何杨平、王雅丽等（2017）：《网络营销》，人民邮电出版社（01）：353。

[He Xiaobing, He Yangping, Wang Yali, et al. (2017). "Online Marketing." People's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Press (01): 353.]

朱志平、卢勇（2024）：“乡村精神文明建设中民俗遗产化的价值逻辑及其实现”，《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03）：62-73。

[Zhu Zhiping, Lu Yong (2024). "The Value Logic and Implementation of Folk Heritage in Rural Spiritu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Journal of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03): 62-73.]

楚小庆（2022）：“技术进步对艺术语言表达与创作形式表现新特征的影响”，《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06): 46-67。

[Chu Xiaqing (2022). "The impact of technological progress on the new features of artistic language expression and creative forms." *Journal of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06): 46-67.]

李开复、陈楸帆(2022):《AI未来进行式》。浙江人民出版社。

[Li Kaifu, Chen Qifan (2022): *AI Future Progression*. Zhejia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燕道成、谈阔霖(2019):“狂欢理论视阈下网红经济与文化的作用机制”,《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05):134-139。

[Yan Daocheng, Tan Kuolin (2019): "The Mechanism of the Role of Internet Celebrity Economy and Cul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arnival Theory." *Modern Communicatio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05): 134-139.]

叶虎(2006):“巴赫金狂欢理论视域下的网络传播”,《理论建设》(05):66-68。

[Ye Hu (2006). "Network Communi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akhtin's Carnival Theory."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05): 66-68.]

巴赫金(1998):《拉伯雷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

[Bakhtin (1998). *Research on Rabelais*. Hebei Education Press.]

范靖(2022):“狂欢理论视域下网络直播健身的全民化现象研究——以刘畊宏直播健身为例”,《视听》(07):147-150。

[Fan Jing (2022): "Research on the popularization of online live fitnes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arnival theory - taking Liu Genghong's live fitness as an example." *Audiovisual* (07): 147-150.]

巴赫金(1988):《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复调小说理论》,三联书店。

[Bakhtin (1988). *Problems in Dostoevsky's Poetics: Theory of Polyphonic Fiction*.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刘秀真(2017):“自媒体时代网络舆论的异化与治理”,《沈阳农业大学学报》(06):761-764。

[Liu Xiuzhen (2017). "The Alienation and Governance of Online Public Opinion in the Era of Self Media." *Journal of Shenya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06): 761-764.]

李汶炫(2012):“网络把关:责任缺失与依法管控”,《青年记者》(12):30-31。

[Li Wenxuan (2012). "Online Control: Lack of Responsibility and Legal Control." *Young Journalists* (12): 30-31.]

丁柏铨(2012):“论当下舆论引导格局”,《中国出版》(12):5-10。

[Ding Baiquan (2012). "On the Current Pattern of Public Opinion Guidance." *China Publishing* (12): 5-10.]

隋岩、常启云(2016):“社会化媒体传播中的主体性崛起与群体性认同”,《新闻记者》(02):48-53。

[Sui Yan, Chang Qiyun (2016). "The Rise of Subjectivity and Group Identity in Social Media Communication." *News Reporters*, (02): 48-53.]

姚涵(2016):“新媒体发展与话语生态变革”,《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10):57-62。

[Yao Han (2016). "The Development of New Media the Transformation of Discourse Ecology." *Research on Mao Zedong and Deng Xiaoping Theory* (10): 57-62.]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2021-06-17):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互联网营销师国家职业技能标准 (征求意见稿)》和《燃气储运工国家技能标准 (征求意见稿)》等 21 个职业标准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 https://www.mohrss.gov.cn/SYrlzyhshbzb/zcfg/SYzhengqiuyijian/202106/t20210617_416598.html.

[Ministry of Human Resources and Social Securit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21, June 17). Notice of the Ministry of Human Resources and Social Security on the public solicitation of opinions on 21 professional standards, including the National Vocational Skills Standards for Internet Marketers (Draft for Comments) and the National Skills Standards for Gas Storage and Transportation Workers (Draft for Comments). https://www.mohrss.gov.cn/SYrlzyhshbzb/zcfg/SYzhengqiuyijian/202106/t20210617_416598.html.]